

异质性、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刘易斯转折

王 卫, 佟光霁

(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仍有转移的空间和必要, 而近些年民工荒现象不同程度的显现, 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 形成了差异巨大甚至对立的研究结论。文章通过对传统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同质性和技术进步中性假设符合现实性的修正, 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现存的民工荒现象, 结论表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上涨并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表征。结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分析, 认为有必要在教育技能培训、职业农民培育、劳务品牌打造、农民工市民化和深化改革等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有效转移。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异质性; 技术进步偏向性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4) 02-0067-09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14.02.008

Heterogeneity, Technical Change Direction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WANG Wei, TONG Guangj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Empirical data illustrates that there is potential and necessary to transfer rural labor, and a variety of appearing of labor shortage phenomenon causes discussion among scholars about whether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been arrived, but the study conclusion is quite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Lewis model, labor homogeneity and hypothesis of neutral technical progress coordinate with amendment of reality, which manifest that labor shortage and the rise in wages do not represent the arriving of Lewis turning point.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diversified measures, consist of education skills training,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farmers, creating labor service brand,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labor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is essential to carry out order and effectiv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labor heterogeneity; technical change direction

收稿日期: 2013-09-06; 修订日期: 2013-12-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职业农民培育研究”(20120062110004)。

作者简介: 王卫,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佟光霁,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统计年鉴 2012》的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就业比重由 70.5% 下降到 34.8%, 而在已经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及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该比重均低于 20%, 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效果显著, 但与转移完成国家相比差距依旧明显。按照 2003~2011 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年均下降 1.79 个百分点的速度^①计算, 将该比重降至 10% 需要将近 14 年的时间, 而比重下降速度明显减缓预示着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完全转移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自“民工荒”现象于 2004 年在东部沿海初见端倪, 至新一轮“民工荒”于 2011 年在东部沿海出现, 甚至在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程度显现, 这些似乎预示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渐式微, 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的关注与讨论, 但学者们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一、刘易斯转折与文献综述

“刘易斯拐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 1954 年在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提出的由刘易斯模型所引申得出的重大转折的时间段, 随后经过拉尼斯和费景汉于 1961 年对其模型的修正, 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并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两个拐点和三个阶段, 刘易斯于 1972 年也肯定了两个拐点的论述。李刚将三个阶段总结为显性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隐性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阶段^[1]。衔接三个阶段的两个拐点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第一拐点代表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完全转移, 其标志为工资水平的上升; 第二拐点代表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农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劳动力完全转移, 其标志为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 因此, 该点也被称为“商业化点”。刘易斯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 而是第二个。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多以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工资水平上升等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志, 可见多数国内学者的定义更接近上述描述中“第一拐点”的概念, 故而也得出了我国已进入或者突破了刘易斯拐点的论断。若以第二拐点作为衡量标准, 得到的结论将不会有任何争议。《中国统计年鉴 2012》统计数据表明, 2011 年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 17856 元/人, 非农劳动力生产率为 86452 元/人,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和非农劳动力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2.93% 和 12.12%, 若以此速度推算, 还需要 220 年中国才能迎来“第二拐点”。

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研究结论形成了三种观点, 前两种将刘易斯拐点以时间点进行论断, 其结论是对立的, 即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或尚未到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时间区间, 且我国即将进入或正处于这个区间之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下降和农民工工资明显提升^[2], 农业越来越倾向于节约劳力型发展^[3], 贫困地区的实际工资加速上涨^[4], 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在 2009 年便超过了制度工资^[5], 这些迹象均支持了第一种观点, 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6-7], 明显提高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仍与工业部门工资有明显差距^[8], 表现为劳动力剩余下的供给不足^[9], 保守估计农村仍有 15% 的剩余劳动力^[10], 城乡差距变化源于中央的惠农政策^[11], 这些观点支持了第二种观点, 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面对众多学者的质疑, 蔡昉的进一步研究指出, 这个拐点到达之后, 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减慢^[12], 当下的“民工荒”现象也不能代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刘易斯拐点不是在短时间完成的观点^[13], 形成了对刘易斯拐点判断的第三种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 李月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已经逼近刘易斯拐点, 而中西部地区距离刘易斯拐点

① 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计算得出。

仍存在一定距离,分析认为中国还需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4];而汪进等人根据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判断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5]。

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研究的刘易斯拐点基本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且劳动力工资上升为标志的“第一拐点”^①。刘易斯模型假设剩余劳动力只出现在农业部门中,而实际上城市的传统部门聚集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6],即便种种迹象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但城市非正规经济已逐渐成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蔡昉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进行了估计,结果认为即使假设8000余万灵活就业人员中有一半就业比较稳定,则仍有4000万属于就业困难人员^[7],并不能以此断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完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为49.68%,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8],这意味着全国有16.68%的人口,即1.1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报告也指出,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其中流动人口为2.30亿^②。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11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0%^③,而《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当年的城市化率(51.3%)和粮食商品化率(56.6%)均超过50%,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之低预示着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以工资水平上升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刘易斯本人也强调了工资水平上升的外生变化不应被纳入模型,如果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劳动力稀缺造成的,则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倘若是外生条件导致的工资水平上涨^④,则无法以此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征。

刘易斯模型一直被推崇为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典模型,且对中国过去存在的“民工潮”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近年来的“民工荒”却对其构成严峻挑战,而一个好的理论模型,应该能够同时解释这两种现象。基于此,本文在刘易斯转折研究综述基础上,从均衡视角出发,以供给和需求曲线为分析工具,对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同质性和工业技术进步中性假设条件进行符合现实性的修正,并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特征对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进行合理判断,为解决民工荒现象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放弃劳动力同质性与技术进步中性假设的刘易斯模型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作为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离不开供求关系的影响。供给方面,几乎所有经典二元经济模型的前提假设均为农村劳动力是同质的,刘易斯模型也不例外,这无疑与劳动力素质与技能存在差异的实际情况有悖;需求方面,模型认为非农部门技术进步始终是中性的,而实际上我国技术进步引致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的增长^[9]。因此,本文结合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同质性和工业技术进步中性假设条件的变化,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符合现实性的修正,并以此解释工资上涨与民工荒现象,并对刘易斯拐点进行合理判断。

1. 模型假设条件的修正

修正假设₁:农村劳动力异质性。原模型假设农村劳动力都是同质的,而现实中,农业部门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再是简单的没有任何技能的原生劳动力,其差异化特征凸显,表现

① 后面未明确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均代表“第一拐点”。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人户分离人口指的是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口指的是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 工资水平上涨的原因可能很多,例如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农村保留价格上升、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和科技进步与政策调整,等等,而这些都是外生的条件。

为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要素。

修正假设₂: 工业部门技术发展路径为偏向性技术进步。原模型假设工业部门沿着一种技术进步中性型的路径发展, 而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 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将带来对具有人力资本性质劳动力的吸纳, 由于这部分劳动力生产率较高, 对原生无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 劳动力数量需求不断下降, 工业部门的发展路径转变为依赖于人力资本(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路径。

结合上述分析, 劳动力异质性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将对原模型中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产生影响,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刘易斯模型。

2. 考虑劳动力异质性的供给曲线变动

由于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特征, 刘易斯模型中的供给曲线不再仅仅取决于固定的“生存工资”水平, 还应当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约束, 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将不再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无限供给弹性直线。针对刘易斯模型中供给曲线的改进, 在“民工荒”初显之际便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周清杰提出了 Z 字形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20]; 包小忠结合中国的现实, 认为在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线之前还有一个向右上方倾斜的阶段^[21]; 杨国才基于劳动力“质”的参差不齐, 认为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个向上攀升的阶梯状折线^[22]; 刘勇基于主次两类市场劳动力的异质性和市场选择, 认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呈弯曲向上的拐折曲线^[23]; 孙良媛等人引入代际异质性, 认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攀升的阶梯状折线^[24]。

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呈弯曲阶梯形很好地解释了“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 综合学者们的核心观点并结合对刘易斯拐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或在刘易斯拐点区域可能存在 N 次拐折 ($N=1, 2, 3, \dots$), 每次拐折代表着一定工资标准下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束(每个 N 对应着一个 L 值), 而工资标准的界定取决于“生存工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如图 1)。^①《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2》中关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数据显示, 不识字或识字者占 5.5%, 小学程度者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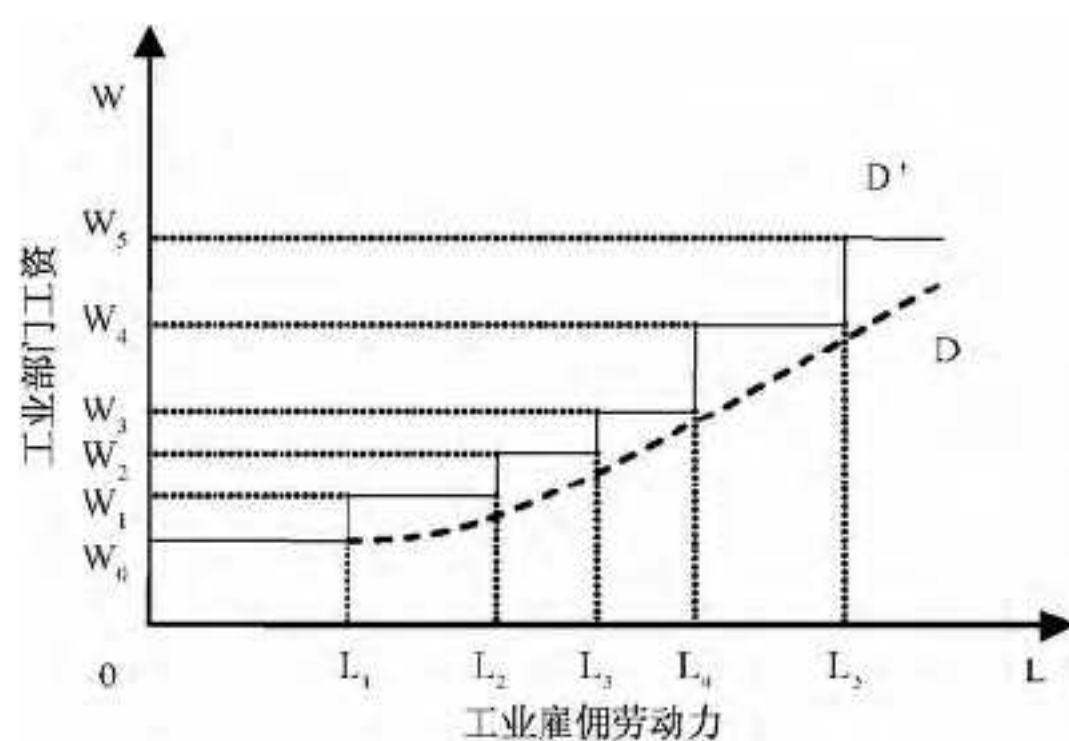


图 1 考虑农村劳动力异质性的供给曲线

26.5%, 初中程度者占 53%, 高中程度者占 9.9%, 中专程度者占 2.5%, 大专及大专以上程度者占 2.7%;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中, 不识字或识字者占 1.5%, 小学程度者占 14.3%, 初中程度者占 60.5%, 高中程度者占 13.3%, 中专及以上程度者占 10.4%。尽管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较平均水平有所上升, 但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重仍占到了 76.3%, 并且在外出农民工中没有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比重达 74.4%。文化和技能水平的普遍偏低, 导致对应低工资标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较大, 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 与之对应的劳动力数量将递减, 即 N 越小与其对应的 L 越多, 随着 N 的增加, 对应的 L 将不断减少。长期来看, 便形成了如图 1 所示的底端较为平缓并不断上升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

3. 考虑到技术进步偏向性的需求曲线变动

原模型假设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工业部门的资本扩张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也按照该路径向外扩张。但随着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比例可能发生变化, 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有了更高的要求, 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正由中性向人力资本偏向

性转变，符合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技能型劳动力成为稀缺的需求对象。考虑到技能型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因素，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才能雇佣到符合要求的技能型劳动力，同时考虑到技能型劳动力的稀缺性，替代品数量的减少将导致需求弹性变小，从而形成的新需求曲线的斜率大于原来的需求曲线。由此可见，新需求曲线的斜率实际上取决于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结构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匹配程度，若没有与之匹配的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斜率将越来越大。如前面所述，我国农民工中 76.3%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和 74.4% 未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比重必然导致斜率的增大，由此便形成了图 2 的需求曲线扩张路径： $K_1 \rightarrow K'_2 \rightarrow K'_3$ 。

4. 假设修正后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均衡吸纳量

以实线表示原模型，虚线表示新模型（ K_1 不变），从而可以将放弃劳动力同质性与中性技术进步假设的刘易斯模型同笔者的新模型进行清晰对比（见图 2）。从原模型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供求均衡点来看，工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均衡吸纳量分别为 L_1 、 L_2 、 L_3 。原模型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为中性，因而工业部门资本扩张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由 $K_1 \rightarrow K_2 \rightarrow K_3$ 向外扩张，而考虑到人力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工业部门资本扩张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由 $K_1 \rightarrow K'_2 \rightarrow K'_3$ 向外扩张。与原模型相比，被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在各个阶段均有所下降。为更直观分析吸纳量的变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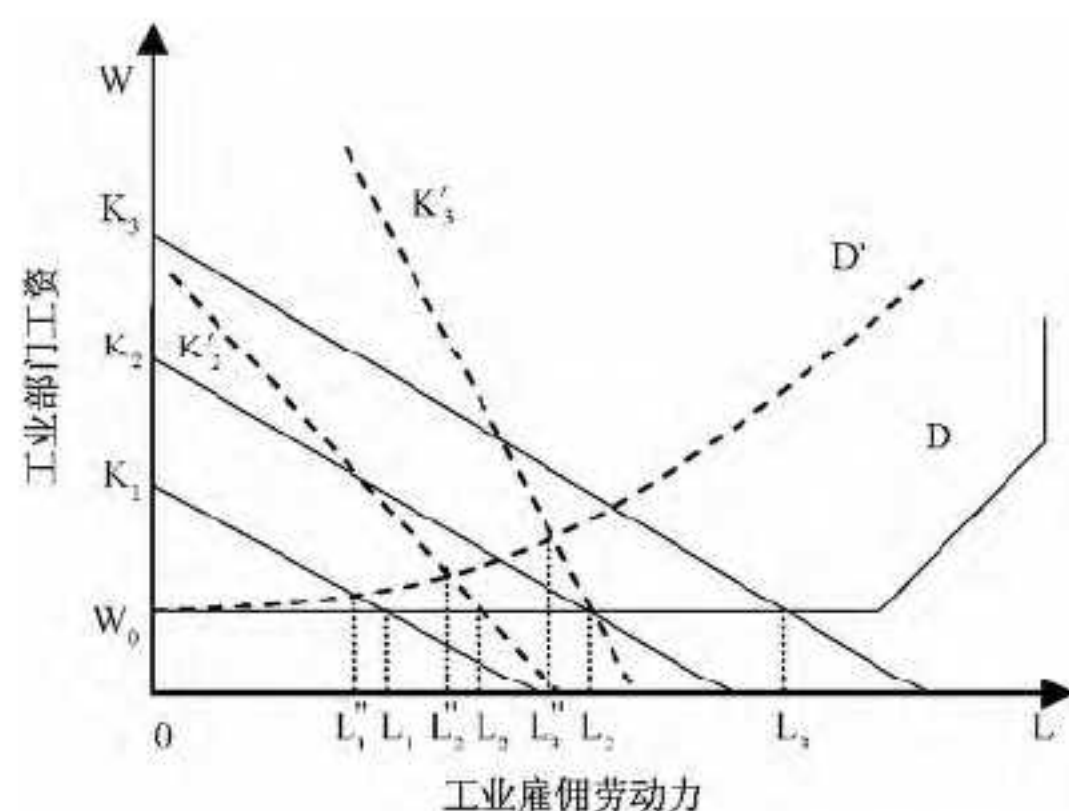


图 2 放弃劳动力同质性与技术进步中性假设的刘易斯模型

K_2 变动为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均衡吸纳量由 L_2 减少到 L'_2 。原模型的劳动力同质性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平行于横轴的无限供给弹性直线，新模型的供给曲线正如上面所论述，不仅取决于固定的“生存工资”（ W_0 ），还取决于人力投资成本约束，其形状是底端较为平缓并不断上升的曲线，曲线上点切线的斜率便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因此，新模型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由 $D \rightarrow D'$ 发展，此时仍然以 K_2 变动为例，农村劳动力的均衡吸纳量由 L'_2 减少到 L''_2 。综合对比模型变化的前后，新模型下工业部门在各阶段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均衡吸纳量分别为 L'_1 、 L'_2 和 L'_3 ，分别比原模型的均衡吸纳量减少了 $L_1 - L'_1$ 、 $L_2 - L'_2$ 和 $L_3 - L'_3$ ，均衡吸纳量的减少量即考虑异质性和技术进步偏向性而形成的“吸纳缺口”。从供需角度可解释为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与农业部门劳动力技能的“匹配缺口”，当不匹配程度加大时，劳动力因技能限制的稀缺程度更加明显，体现为同样条件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斜率加大，同时考虑到体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供给曲线斜率也可能变大，两方面的作用将产生更大的劳动力“吸纳缺口”。因此，“缺口”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与农业部门劳动力技能的不匹配程度。

5. 假设修正后刘易斯模型的结论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个体差异化日益明显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工业部门并不能如刘易斯模型所说的那样吸纳完所有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而表现为劳动力异质性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导致的“吸纳缺口”，从供需角度也可以解释为需求方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与供给方农业部门劳动力技能的“匹配缺口”。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工业化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劳动需求向技能化转变的倾向^[25]，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倾向于技能劳动者^[26~27]。就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劳动者实际的技术升级之间的时滞长短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程度^[28]，只有劳动力对预期技术进步进

行了相应的技能培训或人力资本投资,才可能有效填补这一缺口。而事实上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往往表现为部分低技能原生农村劳动力由于“技能门槛”的限制,无法达到技术进步和产业调整后工业部门的“技能需求”,从而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即在农业部门处于失业状态的同时,在工业部门因技能限制亦无法就业。由此可见,缩减“缺口”不但要提升整个农村劳动力群体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这种技能的提升要以针对工业部门的具体技术进步和产业调整为前提。同时,新模型合理地解释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现象,由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存在一定的“技能门槛”,导致农业部门中只有符合工业部门技能要求的农村劳动力才能够成功转移,而对于众多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村原生劳动力则缺乏转移机会。

模型结论表明即使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现象也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上涨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不能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已从过剩阶段进入短缺阶段。尽管刘易斯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定义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但他也反思了自己的理论,认为这是基于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静态模型的结论,与此同时,劳动力同质假设也被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进行了批判,随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其研究中对劳动力剩余进行了新的界定,因此,从劳动力异质性和技术进步偏向性两方面对刘易斯模型假设的修正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结论之所以大相径庭,一方面是方法可能存在着缺陷,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教条地套用刘易斯模型的结论分析我国的具体问题,而刘易斯拐点理论描述的只是特定经济制度、体制、水平和模式的状态,因此,研究刘易斯拐点和二元经济转型发展不但要把握共性的问题,还要深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现象。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刘易斯转折的特殊性

与国外已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相比,我国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且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自建立以来我国便开始发展工业化,而真正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才启动,将近30年的滞后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转型路径不同于其他国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1. 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真正减少

刘易斯模型中假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实现完全转移的,而实际上由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的限制,将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全部实现市民化是不现实的^①。出现兼业和回流并不能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真正转移,部分农村劳动力只实现了“业的转移”,并未实现“人的转移”,特别是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深化和劳力节约使得农村适龄劳动力完全可以实现兼业型转移,客观上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持续存在。

2. 城镇化进程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矛盾使得工业化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低于制度工资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去就业,此时,较高的工业化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带来较高的劳动力技能需求,供需失衡将这一部分劳动力排除在市场之外。即便此时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拐点或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因离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尚远,收入分配差距的

^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以2011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指出将现有1.6亿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约为1.8万亿元。其中,保障性住房成本、随迁子女教育、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成本分别为1.4万亿元、3214.70亿元、938.13亿元和155.07亿元。具体参考:中国经营网,中国城镇化账本:1.6亿农民工市民化需1.8万亿 [EB/OL]. 2013-05-07.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30507/465392.html>

持续扩大仍继续约束着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3. 农村劳动力代际异质性差异明显

劳动力异质性不但体现在同辈技能和素质的差异上，更体现在新生代与父辈劳动力的代际性差异上。统计数据显示，4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至2012年的40.7%，平均年龄上涨了3.3岁，婚姻、家庭和子女的种种约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地域范围，而且逐渐成为转移主力军的新一代农民工在性格特征与行为导向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差异^[9]，不单要满足工资收入，其对工作条件、社会保障等的方面要求较高，新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必然导致其生活成本增大^①，成本增加要求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导致劳动力供需均衡缺口更大。

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完全符合二元经济理论

城镇在吸纳来自农业部门转移就业劳动力的同时，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排斥作用，导致我国在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同时难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我国的人口特征决定了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非农产业存在的必然，这些都是传统二元经济没有考虑的，也体现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的特殊性。

因此，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过刘易斯拐点或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的判断不能单纯依赖传统模型结论，其不仅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和工资水平等的变化，更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非农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不同代际劳动力的价值变迁和生活环境与成本的变化。无论我国经过刘易斯拐点与否，经验数据均说明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仍将是十分漫长的，寻求合理对策解决我国现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论和对策建议

模型结果表明，民工荒现象和工资水平上涨并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表征，即使没有经过刘易斯拐点或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也可能出现上述现象。通过对刘易斯模型同质性和技术进步中性假设条件的现实性修正，本文解释了我国在农村劳动力仍有剩余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我国的现实条件也证实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如果仅以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进行我国政策的调整可能带来偏差，当务之急是应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供求失衡问题，使农村劳动力不仅仅停留于“业的转移”层面，更要保证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上雇佣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实现农村劳动力向产业工人和市民身份的转变。

模型表明，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仍有剩余的条件下，出现供需缺口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无法满足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用人需求。而随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持续发展，这种现象将更加明显，很可能出现我国刚经过刘易斯第一拐点或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时，工业化已达到了发展中后期的状况。简单看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使其满足企业要求可以直接解决这一问题，但事实上“民工荒”现象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的处理方式未必奏效。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使得雇佣双方风险增加，制约了雇佣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需求方对于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存在疑问，也导致了城镇企业的招工困

① 2012年《中国投资参考》(FT China Confidential)对中国各地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90后农民工支出占收入的53%，80后和70后该比重分别为47.2%和38.3%。详见：James K. Migrant Workers Shape China's Future [EB/OL]. [2013-04-22] www.ft.com/intl/cms/s/0/de19ac9a-a749-11e2-9f8e-00144feabdc0.html#ax222SJtgRlu3

难。而且近几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弱化使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要素成本迅速上升,部分行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转移成本的上升也制约了理性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之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些都可能导致农村劳动力出现供需缺口。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考虑,运用多元化手段解决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第一,加强农村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手段,教育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技能培训可以在短期内使待转移农村劳动力满足部分企业的技术进步需求,特别是以政府主导的市场针对性就业培训模式更具成效。鉴于“40、50”群体近几年转移受限的状况,对其进行技能培训显得格外重要,充分把握地域特点和历史文化量身订制个性化的技能培训,使其即使跟随子女进城也不会轻易地被城镇边缘化。

第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需要懂技术和会经营的现代新型农民,专业化农民生产技能的提升必然带来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解放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力,使农村不断产生可转移的劳动力,同时可以保证在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三,打造区域劳务品牌。劳务品牌是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技能和无形品格的综合象征,在目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劳动力雇佣市场中,企业和雇主更倾向于雇佣品牌劳动力,劳务品牌可以通过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直接或间接降低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现雇佣双方的有效沟通^[5],同时品牌劳动力的技能特征更容易满足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是解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有效手段,而目前的市民化成本极高,而且尽管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与日俱增,但其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镇较低收入户(注:《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以2011年为例,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24588元;《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镇人口较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24903元),同时二元经济制度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在大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潜力殆尽的同时,需要不断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并且将工资收入较高和雇佣关系稳定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市民化。

第五,深化制度改革。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积极性,逐渐将户籍制度与保障福利松绑,构建城乡统一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劳动者向产业工人的真正转变。

参考文献:

- [1] 李刚. 工资上升、劳动力短缺与刘易斯拐点幻觉 [J]. 人口与经济, 2012, (6).
- [2] 蔡昉, 王美艳.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事实法的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10).
- [3] 王美艳. 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么? ——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 [M] // 蔡昉, 杨涛, 黄益平. 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4] 张晓波, 杨进, 王生林.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拐点了么? ——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 [M] // 蔡昉, 杨涛, 黄益平. 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5] 魏征, Marco G. Ercolani, 郝睿. 解析 1965—2009 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 [M] // 蔡昉, 杨涛, 黄益平. 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6] 樊纲. 刘易斯拐点: 热议下的迷惘与省思 [N]. 解放日报, 2010-09-19 (005).
- [7] 周天勇. 中国劳动力是否过剩——刘易斯拐点来临或待 2020 年后 [J]. 上海经济, 2010, (11).
- [8] 毛学峰, 刘靖. 刘易斯转折点真的到来了吗 [J]. 金融研究, 2011, (8).
- [9] 丁守海.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5).

- [10] 杨继军, 范从来.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J]. 经济学家, 2012, (2).
- [11] 李宾. 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么? ——基于城乡差距变化视角 [J]. 当代财经, 2012, (12).
- [12] 蔡昉. 如何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 (2).
- [13] Fei J. H., G. Rani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 1997.
- [14] 李月.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 20 世纪 60~70 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 (9).
- [15] 汪进, 钟笑寒.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5).
- [16] Bai M. K.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 [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2, (2).
- [17] 蔡昉. 民工荒与就业难: 一个矛盾现象 [N]. 北京日报, 2011-10-31 (018).
- [18] 李兵弟. 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约 33% [N]. 中国青年报, 2011-12-04 (01).
- [19] 宋冬林, 王林辉, 董直庆.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0, (5).
- [20] 周清杰.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研究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4, (6).
- [21] 包小忠. 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 [J]. 经济学家, 2005, (4).
- [22] 杨国才.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J]. 技术经济, 2006, (9).
- [23] 刘勇. 二元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拐折模型分析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7).
- [24] 孙良媛, 叶楚红, 费茸.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4).
- [25] Machin S., R. J. Van. Technology and Changes in Skil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Seven OECD Countri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4).
- [26] Bauer T. K., S. Bender. Technological Chang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Job Turnover [J]. Labor Economics, 2004, (3).
- [27] Ochs C., H. Welsch. Technology,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West Germany: A Factor-share Analysis 1976 - 1994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5, (2).
- [28] 罗润东. 当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6, (4).
- [29] 李建华, 郭青. 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3).
- [30] 王卫, 佟光霁. 品牌信号在劳务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J]. 当代经济管理, 2013, (7).

责任编辑 冯 乐